

逆向混改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武悦晴

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8日

摘要

本文基于现有文献, 系统梳理了逆向混改的动因、正负效应, 绿色创新绩效的定义和指标评价体系, 以及逆向混改和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作用机制和国有资本持股比例的影响。研究表明: 国资逆向混改的动因是为了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逆向混改的动因是优化治理结构、缓解融资约束并获取资源; 逆向混改既有改善企业融资、治理与ESG表现等正向作用, 也存在行政干预、成本增加及经营僵化等负面效应。绿色创新绩效是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产生的综合成效, 其评价包含传统投入产出与多维度综合两类指标体系, 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标准。逆向混改整体能够提升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但也存在部分实施效果不达预期的特例。逆向混改主要通过政府补贴、治理优化等路径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且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越高, 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越显著。当前逆向混改与绿色创新绩效相关研究尚处初步探索阶段, 未来需对比不同国资入股对民企绿色创新策略的影响差异, 剖析逆向混改后企业内部非正式制度的变动及其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与调节机制, 并结合政策与技术演进开展动态研究, 指导民企绿色可持续发展实践。

关键词

逆向混改, 民营企业, 绿色创新绩效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Reverse Mixed-Ownership Reform and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Yueqing W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May 13, 2026; accepted: June 9, 2026; published: June 18, 2026

Abstract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motivatio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文章引用: 武悦晴. 逆向混改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综述[J]. 国际会计前沿, 2026, 15(3): 744-750.

DOI: 10.12677/fia.2026.153077

effects of revers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the definition and indicator evaluation system of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and mechanism between revers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and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of state-owned capital shareholding ratio.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motivation for state-owned capital to promote revers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lies in boos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enterprises carry out revers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to optimize governance structure, eas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acquire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Revers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exerts positive effects such as improving corporate financing conditions,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ESG performance, while also bringing negative implication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rising operating costs and operational rigidity.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efers to the comprehensive outcomes generated by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whose evaluation system 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 traditional input-output indicators and multi-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and there is yet no unified evaluation standard in academic circles. Overall, revers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can enhance th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ough a few cases fail to achieve expecte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It mainly improves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pathways such as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furthermore, a higher shareholding ratio of state-owned capital yields a more prominent promotional effect on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urrent research on revers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and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exploratory stage.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different state-owned capital investments on private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strategies, analyze changes in enterprises' internal informal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ir mediating and regulating mechanisms for gre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conduct dynamic research alongside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to guide the sustainable green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Keywords

Reverse Mixed Modification, Private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双碳目标背景下, 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渗透各产业领域, 而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落脚点在于推动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其中绿色创新是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路径之一[1]。企业绿色创新是指企业开展的一系列有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的创新活动[2]。随着“双碳”战略的提出和环境规制的加强, 企业绿色创新已成必然趋势[3]。然而, 企业绿色创新的收益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4], 多数民营企业在绿色创新实践中呈现出“有心而无力”的困境。一方面, 民营企业自身资金实力相对有限, 融资渠道狭窄, 难以满足绿色创新大量的研发资金的需求; 另一方面, 绿色创新技术从研发到成熟应用周期长、回报速度慢, 企业面临着技术失败、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这些原因导致民营企业在进行绿色创新方面的决策时心存顾虑, 限制了其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5]。

近年来, 为改善民营企业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困境, 提升其绿色创新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国有资本加速注入民营企业, 重点布局环保、能源等关键领域, 环保、能源等行业民营企业“逆向混改”数量陡增。逆向混改的兴起不仅为这些民营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也强化了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导向和外部约束, 加速了企业开展绿色创新行为, 从而引发了学者们对逆向混改背景下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变

化的广泛讨论与关注。本文通过梳理逆向混改和绿色创新绩效的相关文献，了解企业逆向混改的动因、效应，厘清绿色创新绩效的定义和指标衡量体系，并总结逆向混改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逆向混改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民营企业逆向混改与绿色创新绩效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2. 逆向混改的相关研究

2.1. 关于逆向混改的动因研究

逆向混改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改革模式，其动因是研究企业绩效等问题的重要逻辑起点，关于民营企业参与“逆向混改”的动因，学者们通常从国有资本角度和民营企业角度进行分析。从国有资本层面来看，国资实施逆向混改是为了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互补[6]。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生产力的重心已逐渐向新质生产力转移[7]。通过逆向混改，国有资本能够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助力“国民共进”良性发展格局的形成，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8]。从民营企业层面来看，国有资本的加入在公司治理、内部融资和外部环境等方面为民营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公司治理方面，引入国有资本能够提高民营企业股权制衡度，缓解代理问题[9]。在内部融资方面，国有资本的隐性担保作用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信用评级，使其在金融市场中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从而突破融资困境[10]。在外部环境方面，国有资本的加入使民营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包括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多个方面[11]。

2.2. 关于逆向混改的效应研究

逆向混改的实施效果是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创新绩效的关键落脚点，学术界认为逆向混改既可能会为民营企业带来正向的影响，也可能会带来负向的影响。

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治理和 ESG 表现等多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企业融资方面，许多学者研究指出，通过逆向混改企业不仅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资金来源，还能借助国有资本的信用背书，提升自身在金融市场中的融资能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支持[12] [13]。在公司治理方面，有研究指出，逆向混改通过优化治理结构，提高了企业在面对复杂市场环境和不确定性因素时的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使得企业在追求更高收益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14]。在 ESG 表现方面，逆向混改能够助推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显著提升企业的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绩效[15]。随着国有资本的进入，民营企业在经营理念和治理模式上逐渐向国有企业靠拢，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环境方面，企业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减少污染物排放；在社会方面，企业会更加关注员工权益保护、社区发展以及社会公益事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企业会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通过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企业提升 ESG 绩效、树立良好社会形象，还能增强其在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然而，逆向混改也可能在经营决策、成本控制和僵化风险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在经营决策方面，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持股后，可能会引发行政干预效应[16]。这种行政干预主要体现在企业经营决策过程中，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治理理念、决策机制以及风险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国有资本的进入往往伴随着对民营企业原有治理模式和经营自主性的一定限制，国有资本的介入可能导致企业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进而削弱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内部控制的弱化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还可能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从而提高企业被监管问询的风险，对企业声誉和市场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在成本控制方面，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后，企业的雇员成本、代理成本以及对政府补助的依赖程度等均呈现上升趋势[17]。一方面，国有资本的进入可能促使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向国有企业靠拢，导致企业薪酬体系和福利待遇的调整，从而增加了雇员成本；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民营

企业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代理成本的上升。在僵化风险方面，国有资本的介入还可能增加管理者的惰性，当政府补助超过一定水平后，民营企业的“僵尸化”风险就会增大[18]。民营企业对政府补助的依赖增加，可能使企业过度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竞争力的提升。

3. 绿色创新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

3.1. 绿色创新绩效的定义

“绿色创新绩效”这一概念是随着绿色创新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绿色创新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最初主要集中于探讨其科学内涵、评估绿色创新发展能力及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学者们逐渐关注到绿色创新活动的成效及其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绿色创新绩效”这一概念。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主要与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学习能力、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以及政府补助和环境规制有关[19]-[21]。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关于绿色创新的定义没有得到明确界定。

3.2. 绿色创新绩效指标衡量体系

学术界在绿色创新绩效的衡量体系方面尚未达成统一的标准，主流研究主要可分为传统指标体系与综合指标体系两大类。

传统指标体系聚焦于绿色创新的产出和投入。国外学者 Alegre 等(2006)认为绿色创新绩效涵盖过程与结果两个维度，包含了转化效率与产出效益[22]。Anthony & Rene (2009)提出，绿色创新绩效可分为间接绩效、直接绩效和知识产出水平[23]。Tseng 等(2013)认为绿色创新绩效评价应该涵盖管理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四个方面[24]。国内学者们通过对绿色创新投入资源，如研发资金、人力投入[25]；与产出成果，如绿色专利数量、新产品开发[26]的量化分析，初步构建了绿色创新绩效的评价体系。

综合指标体系则考虑了社会价值、环境效益与企业自身发展等更多维度。国外学者 Albort 等(2016)在其研究中指出，传统的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评估往往过于关注环境影响这一单一维度，而忽视了企业综合能力的多维度考量[27]。García-Granero 等(2018)进一步深化了绿色创新绩效的评估维度。他们以绿色创新过程为出发点，将绿色创新绩效细分为产品、过程、营销和组织四个维度，涵盖了绿色创新从设计开发到市场推广、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协同的价值链全流程[28]。Rizos 等(2018)从直接绩效、间接绩效、知识产出、生态绩效、经济绩效等方面构建了绿色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29]。Cheng (2020)提出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不仅要考虑内部治理因素，更要从外部治理的角度，特别是从绿色供应商角度评价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30]。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也逐渐意识到绿色创新绩效的评价不应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投入产出分析，还应涵盖其带来的综合绩效影响。肖仁桥等(2017)在其研究中指出，绿色创新不仅能够带来环境效益，还对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市场竞争能力产生积极影响[31]；杨浩昌等(2020)则强调了绿色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潜在促进作用[32]；王刚和李文龙(2025)进一步综合分析了绿色创新在社会、环境及财务三个维度上的绩效表现，认为绿色创新的综合绩效评价应充分考虑其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升社会福祉以及实现经济价值增长等方面的多重作用[33]。

4. 关于逆向混改与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

国有资本的进入能够为民营环保企业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意愿[34]，并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35]。

4.1. 逆向混改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对逆向混改与民营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发现，民营企业拥有国资背景能够增加

企业的信用度和市场关注度，能够间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36]。同时，逆向混改具有促进专业化发展和缓解融资约束的“双重功效”，能够直接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民营企业提高绿色创新绩效[37]。通过引入国有资本，民营企业能够借助国有企业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资源，实现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提升自身在绿色创新领域的专业化水平；国有资本的参与能够显著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缓解其面临的资金瓶颈，为绿色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4.2. 逆向混改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从逆向混改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机制来看，逆向混改通过政府补贴、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多种路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汤义成(2023)指出，逆向混改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环保补贴和政府补贴，这些补贴不仅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流入，还降低了绿色创新项目的成本，提高了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积极性[38]。李春霞和王志伟(2023)的研究则强调了逆向混改在公司治理优化方面的作用，国有资本的进入能够改善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水平，增强企业内部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从而为绿色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39]。别奥等(2023)进一步指出，逆向混改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使民营企业能够更加从容地投入资源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和创新项目实施[40]。此外，何德旭等(2022)还提到，逆向混改能够减轻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的“统计偏见”。由于国有企业在社会认知和市场评价中往往具有更高的信誉度，民营企业的国有化背景能够提升其在市场中的形象和声誉，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歧视，为绿色创新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41]。

然而，也有部分特例。民营环保企业博世科引入广州环投进行逆向混改后，给企业带来了相对消极的经济后果，强强联合实现战略协同的预期未能达成[42]。这一现象表明，尽管逆向混改总体上为民营环保企业带来了诸多发展机遇，但并非所有案例都能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这说明逆向混改对民营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存在双重影响。

4.3. 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方面，赵鑫等(2023)的研究表明，国有资本的深度介入能够积极助推民营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国有股权的介入能够强化民营企业的吸收转化能力，推动异质性知识实现整合与重构，进而有效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越高，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越显著[43]。毛志宏和魏延鹏(2023)在研究中同样指出，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股东参股后，其绿色创新能力将得到显著改善[44]。

5. 文献述评与展望

5.1. 文献述评

本文从逆向混改的动因、效应，绿色创新绩效的指标衡量体系，以及逆向混改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等方面对民营企业逆向混改和绿色创新绩效展开了系统的综述和评析，通过总结发现：(1) 现有研究揭示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正负双向作用机制，其中正向机制包括改善企业融资、治理与ESG表现等，负向机制包括行政干预、成本增加及经营僵化等；然而，已有文献较少区分不同国资入股背景的差异化影响，也未能细化绿色创新的类型。(2) 尽管学者们已识别出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行业特征及外部制度环境等调节变量，但多数研究聚焦于正式制度层面，对企业内部非正式制度在逆向混改影响绿色创新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与调节机制关注不足，相关实证证据较为匮乏。(3) 目前关于绿色创新绩效的衡量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缺乏针对不同行业的有针对性评价指标，且多数研究采用专利存量或投入产出等静态指标，对逆向混改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识别不够严谨，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有待加强。

5.2. 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有关逆向混改和绿色创新绩效的研究仍较浅,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其一,对比不同国资入股背景带来的差异化影响,探究产业资本型与金融资本型两类国资主体介入后,民营企业在探索式绿色创新与利用式绿色创新策略选择上的异同。其二,深挖企业内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变动,分析逆向混改落地后,企业文化、政治关联等要素发生的变化,及其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与调节机制。其三,采用事件研究法等方法,考察逆向混改公告前后企业绿色专利申请的动态变化,以此评估逆向混改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孙丽文,任相伟,李翼凡. 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一个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22): 82-91.
- [2] 李旭. 绿色创新相关研究的梳理与展望[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5, 27(2): 1-11.
- [3] 解学梅,陈文妍,倪书阳,等.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形象的关系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26, 29(4): 1-16.
- [4] 廖红伟,李昕.“逆向混改”与民营企业绿色转型[J]. 学习与探索, 2024(8): 143-153.
- [5] 贺佳,王分棉,孙宛霖,等.“反向混改”何以影响民营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5, 47(2): 69-83.
- [6] 王彩萍,姜彦君,任金洋,等. 国资参股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创新视角的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 2023(8): 3-15+62.
- [7] 富丽明,田庆.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混改的实践与认识研究[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5): 29-46.
- [8] 闫明杰,马逸欣,罗曼. 逆向混改促进民营企业参与共同富裕实现的内在逻辑、践行路径与保障策略[J]. 财会通讯, 2024(14): 16-22.
- [9] 张静,陈金奕,柴天宇. 环保行业民企“逆向混改”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中建环能为例[J]. 财会通讯, 2023(12): 122-127.
- [10] 李善民,曹铭洋,杨若明,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主体应对——基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23(11): 105-118.
- [11] 徐辉,何悦,骆淑恬.“逆向混改”动因、路径与效果研究——以小康股份引入东风汽车为例[J]. 财会通讯, 2023(18): 97-104.
- [12] 李世刚,钟柠锴. 国有资本参股能降低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吗? [J]. 金融与经济, 2022(10): 26-36.
- [13] 姚圣,徐艺欣. 民营企业“逆向混改”与融资约束缓解: 影响路径与作用效果研究[J/OL].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3): 124-139.
- [14] 潘宗玲.“逆向混改”能提升民企风险承担水平吗? [J]. 财会通讯, 2024(1): 66-70.
- [15] 邵剑兵,姜道平.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 ESG 表现视角研究[J]. 经济问题, 2024(3): 16-22.
- [16] 黄阳,陈培培,游夏蕾,等. 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的治理效应发挥几何?——基于监管问询的证据[J]. 管理工程学报, 2024, 38(1): 162-178.
- [17] 肖正,翟胜宝,张静. 引入国有资本能够化解民营企业僵尸化风险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22, 44(2): 36-56.
- [18] 李田恬,叶建木,程卓俊. 政府补助与企业僵尸化关系: 探讨市场化进程的调节效应[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021, 43(1): 71-76+98.
- [19] Albort-Morant, G., Leal-Rodríguez, A.L. and De Marchi, V. (2018)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Relationship Learning Mechanisms as Complementary Drivers of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2, 432-452. <https://doi.org/10.1108/jkm-07-2017-0310>
- [20] Rauf, F., Baolei, Q., Wanqiu, W., Na, C. and Naveed, K. (2023) R&D Invest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Disclosure and Firm's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de and Global Markets*, **18**, 82-109. <https://doi.org/10.1504/ijtgm.2023.134918>
- [21] Shi, H. and Zhou, Q. (2024)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69**, Article ID: 106088. <https://doi.org/10.1016/j.frl.2024.106088>
- [22] Alegre, J., Lapiedra, R. and Chiva, R. (2006) A Measurement Scale for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9**, 333-346. <https://doi.org/10.1108/14601060610707812>
- [23] Arundel, A. and Kemp, R. (2009) Measuring Eco-Innovation. UNU-MERIT Working Paper No. 2009-017,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3-40.
- [24] Tseng, M., Wang, R., Chiu, A.S.F., Geng, Y. and Lin, Y.H. (2013) Improving Performance of Green Innovation Practices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40**, 71-82. <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1.10.009>
- [25] 程华, 廖中举. 中国区域环境创新绩效评价与研究[J]. 中国环境科学, 2011, 31(3): 522-528.
- [26] 隋俊, 毕克新, 杨朝均, 等. 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基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视角的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3): 440-448.
- [27] Albort-Morant, G., Leal-Millán, A. and Cepeda-Carrión, G. (2016) The Antecedents of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 Model of Learning and Capabilit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9**, 4912-4917. <https://doi.org/10.1016/j.jbusres.2016.04.052>
- [28] García-Granero, E.M., Piedra-Muñoz, L. and Galdeano-Gómez, E. (2018) Eco-innovation Measurement: A Review of Firm Performance Indicator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91**, 304-317. <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8.04.215>
- [29] Rizos, V., Behrens, A. and Taranic, I. (2018) Measuring Progress in Eco-Innovation. Ceps Papers.
- [30] Cheng, C.C.J. (2020)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 Green Supplier Involvement, and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Diversifying Green Entrant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61**, 393-414.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18-3946-7>
- [31] 肖仁桥, 丁娟, 钱丽. 绿色创新绩效评价研究述评[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7(2): 100-110.
- [32] 杨浩昌, 李廉水, 张发明.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J]. 科研管理, 2020, 41(9): 99-112.
- [33] 王刚, 李文龙, 威力思. 新质生产力、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J]. 科学决策, 2025(4): 124-141.
- [34] 曾敏.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J]. 经济学家, 2023(12): 66-76.
- [35] 李涛, 李昂. 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视角[J]. 工业技术经济, 2019, 38(10): 92-100.
- [36] 余汉, 宋慈笈, 宋增基. 国有股权能够推动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1, 23(6): 20-34.
- [37] 吴崇, 顾丹, 张佳奇. “逆向混改”如何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民企绿色创新?——基于代表性产业比较分析的视角[J]. 技术经济, 2024, 43(3): 51-63.
- [38] 汤义成. 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促进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J]. 西部论坛, 2023, 33(6): 96-113.
- [39] 李春霞, 王志伟.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助力还是掣肘? [J]. 金融发展研究, 2023(11): 11-21.
- [40] 别奥, 杨上广, 罗孝玲. 国有股东参股能否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5): 109-122.
- [41] 何德旭, 曾敏, 张硕楠. 国有资本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基于债务融资视角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22, 38(11): 189-207.
- [42] 吴佳佩. 民营环保企业逆向混改动因及效果分析——以博世科为例[J]. 老字号品牌营销, 2025(2): 139-141.
- [43] 赵鑫, 杨棉之, 曹迅. 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 40(7): 23-33.
- [44] 毛志宏, 魏延鹏.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J]. 软科学, 2023, 37(2): 44-50.